



●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资料照片)



● 1942年,延安妇女们在纺线(资料照片)



● 机要员董健民(右)和丈夫及孩子在一起(资料照片)



● 枣园之春(资料照片)

在延安枣园的一段难忘经历

吴民斌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枣园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当谈起这段特殊情况下的往事时,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仍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一个特殊战斗集体的组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迅速发展。无数热血青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赴延安。在这种浪潮下,各色政治组织也有人员介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借机安插人员混入其中,这些人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时隐时现,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

鉴于这一情况,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决定)》。决定提出,整风的任务分为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并提出,鉴于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这次审干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审干是扩大化了,要求纠正这个做法。8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

当时,大部分审查对象的审查工作要在本单位进行。少数一时弄不清的人,送入专门机构审查——边区政府系统的进入“行政学院”,中央系统的到社会部主办的“西北公学”。

当时,中央军委下属的机要机关有几十名技术干部在西北公学接受隔离审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时任情报部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考虑,这批受审查的技术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是特务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在机要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如果长期审查,等待作出结论,势必荒废专业技术。若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则可以起到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即在中央情报部一室下面组成通信联络科,由老同志刘志汉任科长,康斌为副科长。通信联络科的方针是“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李克农副部长对工作骨干栗林、楠林亲切地说:“组织上相信你们,要大胆工作,不要有顾虑。”并分别任命他们为报务组和机要组的组长。于是,以受审查的这批同志为主,加上其他机要单位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这个战斗集体住在枣园后沟。枣园是旧时代留下的一个庄园,后面连着一道山沟。沟外山坡上就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住着中央领导人。沟口的内侧和后沟,住着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保卫部)。这里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秘密工作的核心,有着一种浓烈的团结奋斗的政治气氛——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党和革命的利益作出奉献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和责任,那些作出了奉献和牺牲的同志则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这些尚未得到最后政治历史结论的同志,精神上有着巨大的压力,内心也有种种矛盾、怨气和痛苦,有的遭遇初恋爱人被迫分手或其他不幸的家庭变故。但是,我们是共产党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相信党,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要我们大胆工作,这就是十分珍贵的信任。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无私地奉献。于是,我们就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的胜利而与敌人战斗。李克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但仍关心我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不时听取我们单位的汇报,给予指示。科长刘志汉同志坚决贯彻上级的方针、指示,同时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住在后沟的山腰里,用水要从山下挑上来。在我们工作紧张时,他为了让我们休息好,有时一早就从山下把水挑上来,供我们洗漱。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我们并无被歧视的感觉。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就这样团结战斗起来了。



● 张思德(左)在烧木炭(资料照片)

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

我们工作所针对的首要对象是包围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报务组的栗林同志原来就是电台方面的技术骨干,在他的带领下,一支无线电收听队伍迅速组成,并很快抓住了敌人的无线电通信信号。在报务组,大家都是新手,所以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较大。但大家有种无坚不摧的钻劲和夜以继日的干劲,终于打破了僵局,连续不断地取得了情报。

1944年夏,中央情报部指示我们在巩固对胡宗南系统侦研的基础上,开辟对阎锡山、汪精卫和各路伪军的侦研工作。通信联络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侦收人员由7人增至24人,报务组由5人增至20人,全科由开创时期的19人发展到61人。在对日伪方面,组成了一个3人攻坚小组,由贝波同志负责。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和艰苦努力,终于突破了难点,取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在对汪伪方面,我们侦获了汪伪二方面军孙良诚的保密通讯,取得了该部现有实力、驻地以及进犯我根据地计划的情报。此外,还获得了汪精卫活动的情报。对阎锡山部的侦察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已经能掌握阎锡山部队的信号体制和部队实力、动向等。

在“边工作”的同时,还要“边审查”。有关我的正确的政治历史结论就是在这个时候作出的。吴德同志到科里宣布审查结论,他说我“政治上清白”,是“被敌人诬告的好同志”。同时,宣布我“继续党的生活”,而不是“恢复党的生活”。在“边工作”“边审查”的同时,我们还要“边生产”。副科长康斌同志曾是上海老工人,地下党员,专管行政和生产。那时,为了克服长期抗战造成的物资困难,全延安都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积极参加上山开荒种粮和纺线等生产劳动。记得每个人都制定出了生产计划,纺线的任务是每个人在半年内大约要纺出价值两石小米的棉线(那时在边区,各种物品都按小米折算)。夏天炎热,我们大都不穿鞋袜,而是穿着木板钉上带子的简陋木屐。为了抓紧时间,人们走路都像小跑,时常看不见人影,只听木屐敲地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此外,为了改善小集体的生活,我们还要种菜、帮厨、抬水上山浇地。我们种的西红柿又大又红。

1945年1月,全科同志参加了中央情报部模范工作者评选活动,在相关的大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同志在隐蔽战线为了党的事业历尽千辛万苦、冒着随时可能被捕和遭遇牺牲的危险奋斗不息的感人事迹,深受教育。与此同时,我们也总结了自己的工作,选出了身边的模范。据一些同志回忆,当时选出的甲等劳模是简丰,乙等劳模是王永壮,甲等模范工作者是我,乙等模范工作者是李松青。此外,还有不少同志受到科里的表彰。

配合上党战役的工作高潮和通信联络科历史任务的完成

我们侦察工作上的高潮,是日本投降前后对阎锡山部队的侦察和对上党战役的配合。1945年8月10日下午,我们正在开会学习讨论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电台上有消息说日寇可能投降,人们对此将信将疑。当晚,值班的同志已经上床睡下,忽然传来日军无条件投降的确切消息,我们一跃而起,顾不上穿好衣服就跑到窗外。这时,山沟间已经锣鼓喧天、火炬通明。八年的抗战啊!中国人民经历无数的艰辛和苦难,今天终于胜利了!我们立即加入到山腰间火炬游行的队伍里,随着欢乐的队伍行进。最后,游行的队伍汇聚在礼堂前一个平坝上,进行狂欢庆祝。这时,吴德同志讲话,大概是在传达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现在抗战胜利了,今后的问题就是“争果实”“争桃子”的问题。这个斗争,也将极为激烈,极为残酷,应该有所考虑和准备。

欢庆胜利的狂热情绪在当晚就转变成对现实工作的突击行动,以严密监视敌人的意向和动向。我们很快发现,阎锡山刚刚在日伪军的帮助下返回太原,随即派出重兵前往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偷袭我军后方,抢夺“桃子”。为了监控有关敌情和及时向中央报送材料,电台的同志背着收音机爬到山顶上,蹲在窝棚内工作,以改善侦收条件,多抄电报。他们一天多次上山下山,虽然劳累,但保证了充分的报源。我们研究组的同志也顾不上吃饭睡觉,连续突击半个月。有时,吃着饭,忘记了饭碗;刚刚躺下,又跳了起来。我们精心钻研,改进技术,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力求全面、彻底弄清敌方的行动,及时给中央报送全面、准确的情报。晋东南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等六县,本是我军从敌伪手中夺取并建设的根据地。阎锡山趁我军向敌伪大举反攻之际,秘密派遣其集团军副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约13个师的部队,在日伪军的配合和蒋军的默许下,向我根据地推进,去偷抢我们已经从日伪军手中收复

的“桃子”。我们的情报又快又准,有时当面交给情报部领导同志直送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们送来的情报很重视,对人名、地名及代号加注解的做法很赞许。他对情报部的领导同志说:“现在联络科搞得很有成绩,应该奖励他们。”于是,中央办公厅奖励我们边币50万元,枣园机关后勤部门又给我们杀了一头肥猪。吃肉解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犒赏。中央军委、毛主席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决心首先歼灭进入长治地区的敌人,消除心腹之患,然后移师向东,阻止平汉路敌军的北进。毛主席当面指示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乘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前线,实施“张开口袋歼敌”的行动方针。关于上党战役与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关系,毛主席说:“你们在前方打得越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些。”我们目睹阎军如何一步一步钻进我军正在编织的“口袋”,期待着前线胜利的佳音。这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灭了阎军入侵的主力,俘获史泽波,击毙阎军另一个集团军的副司令彭毓斌。上党战役的歼灭战,是我军在抗战胜利后自卫反击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不仅保卫、巩固了解放区,给反动派以重大打击,而且提高了我方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的地位。

这次突击是我们联络科工作的一个高潮,也是我们联络科完成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通信联络科的机构被撤销,大部分同志重新回到了原单位。



● 《解放日报》上关于张思德追悼会的报道(资料照片)

终生难忘的经历和教育

在联络科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在工作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每个人也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锻炼。我们不仅参加了延安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群众活动,包括纪念联合国成立的群众大会、修建延安机场的劳动、参观七大会场和烈士纪念馆等,而且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谢觉哉和胡乔木等同志所作的形势报告。

特别是在1944年9月8日,我们全科参加了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亲眼聆听了毛主席深情感人的讲话。在枣园沟口临时就地搭建的一个土台子上,几根柱子之间挂着一道横幅,上书“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以悼念几天前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听了这样的讲话,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深深印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终生难忘。它为我们后来担负更艰巨、更重要的工作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后来,这批同志大多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我们的小组里,有一位原来在社会部工作的机要员董健民同志,她朴实、苦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的事情,总是抢先去干。通信联络科撤销以后,她回到社会部,在向东北进军的过程中,奉命从山东渡海去辽宁,途中突遭蒋军军舰拦截盘查。为了保全机密文件,她与丈夫、孩子一起跳进了大海。她的事迹,在《永远的丰碑》节目中被讲述出来,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的深切怀念。我们这些还健在的老同志,也决心活到老、革命到老,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来源:《百年潮》)